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城市体系演化过程^①

The Evolution of Urban System in China under the Globalization Trend

周伟林 王幸

【摘要】无疑，全球化对于中国近30年的城市体系的演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本文通过检视国内外在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和运用3D（Density, Distance, Diversion）分析框架，试图阐释在全球化背景影响下城市群、世界城市、新兴城市、交通通信、产业结构以及区域和城乡一体化，是通过哪些机制产生了哪些变化的。文章还对金融危机后全球化的变化——包括4万亿投资、发展内需、各区域振兴规划出台等新情况与人口、产业、空间布局和城市功能的演化趋势作了进一步讨论。

【关键词】全球化 3D 中国城市体系 演化 趋势

Abstract: It is undoubted that globalization has exerted an significant and profound influence on evolution of urban system in China over the past 30 years. This article tries to explain that what has been changed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of globaliza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urban agglomeration, world cities, newly developed cities,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trend of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through which way these effects took place. Further more,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change aft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including government investment of 4000 billion, the expansion of domestic demand, the spatial layout and city function.

Keywords: globalization, 3D, China's urban system, transformation, trend

1 引言

众所周知，跨国公司凭借雄厚的资本、高额的科技投入、著名的品牌和商誉以及遍布全球的营销网络，使得全球化成为一种势不可挡的强大势力，极大地改变着世界的格局。据联合国统计，20世纪末全世界有44000个跨国公司母公司和28万个在国外的子公司和附属企业，这些跨国公司控制了世界1/3的生产、70%的对外直接投资、2/3的世界贸易与70%以上的专利和其他技术转让^[1]。当代最重要的工业（汽车、电子、航空、石化）和最重要的服务业（金融、保险、电信）都纳入了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和服务网络体系。在这个全球化时代，城市已经成为区域乃至国家发展的核心，成为吸引、集聚、辐射各种资源要素的主要载体。

无疑，全球化的浪潮对于中国近30年的城市体系格局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中国通过改革开放，积极引进外国资本和技术，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之中，由此带动了外贸的高速增长；同时，改变了原先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实施财政分权，使得地方可以因地制宜地进行经济建设。随着外资、先进技术和管理的引入，沿海地区迅速发展起来，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成长为世界级城市群，香港、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大都市的国际地位开始

作者：周伟林，复旦大学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王幸，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① 感谢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区域推进战略：长三角区域现代化进程的模式解构与普遍意义》（批准号：08JJD770107）的资助。

凸显。东部沿海的一大批城镇主动参与到“中国制造”中去，并借此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与升级，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和打破城乡二元分割局面，有效地推动了当地城市化进程。同样，中西部也不甘落后，通过积极改善当地投资环境来吸引更多的人才和资本，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受全球化影响的广度和深度不如东部，存在明显的区域发展差异。总之，过去一些地区和城市因受益于全球化而崛起，也有一些地区和城市由于各种原因错过机遇而落后，造成中国城市体系演化的独特景象。而近来由国际金融危机和碳排放问题所引发的全球化变局，将以新的力量影响中国城市体系的进一步演化。我们不得不思考，怎样才能使新的全球化对中国城市体系产生积极的效应而将其负面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呢？

本文试图对上述问题做出有益的探索。正文部分包括：第一部分是有关全球化和城市体系的文献综述；第二部分，简要描述全球化浪潮兴起的历程及其对于中国城市体系产生的影响；第三部分是文章的核心，借鉴世界银行的3D理论框架，实证分析中国城市体系的演化过程，具体地阐释中国城市体系在全球化影响下通过哪些机制、实际产生了哪些变化；最后部分，探讨在新的全球化变化的局势之下，城市发展模式的调整、区域振兴规划以及制度变革的实施对于中国城市体系演化趋势的实际影响。

2 全球化和城市体系的相关文献

按照英国学者戴维·赫尔德^[2]的说法，“全球化是一个体现社会关系和交易的空间组织变革的过程，此过程可以根据其广度、强度、速度以及影响来衡量，并产生了跨大陆或区域间的流动与活动、交往与权力实施的网络。”全球化的核心是经济全球化，是“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3]。

按其现代的意义来说，城市体系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域范围内由一系列规模不等、职能各异的城市所组成，并具有一定的时空地域结构、相互联系的城市网络的有机整体^[4]。自1950~1960年代，城市规模逐渐扩大，城市群体的现象大规模出现，有关“城市体系”的研究视角，从以单个城市及其腹地为研究对象的中心地理论中凸现出来，渐成理论学说。“城市体系”的概念形成于1960年代。1960年，美国地理学家邓肯及其同事在《大都会与区域》一书中首次提出城市体系之概念。1964年，美国著名地理学家贝里（Berry, B. J. L）引用了这个概念，作为系统分析和一般系统论应用于中心地理论的部分内容。

1970年代，国外城市体系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高潮，这一阶段学者们开始强调城市群经济联系的复杂性和动态性研究，有的学者更是大胆预测世界城市群发展将形成连片巨型大都市区。1980年代，城市群出现郊区化趋势，空间形态由单核心向多核心演化，形成边缘城市。这时的一项研究是将城市群空间结构的演化，划分为单中心、多中心和网络化三个阶段，而对城市体系演化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口和产业等的郊区化、政府调控政策、技术进步、交通运输信息化等几个方面。

同时，全球化尤其是信息时代的到来，促使一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城市的产生，它们分布在全球的若干国家，逐渐形成了一个有机的世界城市体系。学者们也因此开始将目光投向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城市和区域概念。弗雷德曼的研究首先确定一个明确的世界城市（World City）^[5-7]，按照新的全球秩序进行分组，强调每个世界城市都存在规模等级和特性上的差别。他的研究工作很少提供直接的证据，只是应用直接指标提出了最新的世界城市等级体系名单。萨森^[8]进一步从全球角度进行了详细的实证研究，认为制造业日益向全球扩散，而全球生产系统的总部和控制功能却集中在几个主要的全球城市，即世界城市。斯科特^[9]则提出了Global City-Region（GCR）这一概念，认为GCR日益成为现代生活的中心，全球化刺激了其作为所有生产活动——包括制造业、服务业、高技术产业和低技术产业的基础的重要性，狭义的城市已经不如城市一区域或者是区域网络中的城市了。按照斯科特的研究，全球目前有超过300个GCR，每个GCR的人口都超过100万。

有关中国城市体系的研究，虽然城市建设和城市经济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30年中有了不小的发展，城市规划和建设实践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城市体系的研究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开展。这一时期比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是美国学者施坚雅^[10]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国内周一星^[11]的论文《我国城镇等级体系变动的回顾及其省区地域类型》也较有代表性，该文认为国家和省等行政单元是研究城市系统的合理框架，不仅研究了中国城镇等级体系，还研究了全国26个省区级地域单元的城镇等级体系，指出城镇体系具有等级特性，“等级性、层次性是区域城市体系普遍具有的特性”。此后顾朝林^[12]、周军^[13]等关于全国城市体系的研究视角基本上都与此有关。在中国城市全球化联系较弱，且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阶段，国家城市体系的框架是合理的，但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力度不断加大，市场在经济运行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研究城市系统问题就需要对理论假设和研究框架进行调整。

进入 1980 年代以后,一方面,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全国产业分布进行重新布局,设立沿海经济特区和开放城市,积极展开对外贸易和吸引外商来华投资;另一方面,全球化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信息时代的到来使得全球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的一体化成为可能。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受益于内外两股力量的作用而得到了飞速发展;同时,全国的城市体系空间布局也发生了巨变。这引发了国内外学者关于中国城市空间格局演变的研究。顾朝林^[14]认为,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一个新趋势表明当代全球化已经对发展中国家城市发展产生深刻影响,生产区、旅游中心和主要商务金融中心,构成了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对发展中国家城市体系影响的 3 种主要类型区。宁登^[15]把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分为内生城市化和外生城市化两种,认为它们分别来源于内外两个动力系统,其中内生城市化是源于内生系统的变革,如农村工业化的兴起,从而产生了小城镇空间;而外生城市化则是因为全球化、信息时代、交易革命等外部转变的出现,从而加速了沿海地区的城市化、区域化与国际化的进程,形成了巨型城市和城市网络。

有的学者还进一步试图探究城市体系受全球化影响的新的演变趋势。Fujita^[16]通过对城市集聚程度、外国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地区间收入不平衡、户口制度以及政府治理的实证研究,分析了中国城市体系的主要特征,认为空间分布受政策影响显著。顾朝林^[14]提出重构适应全球化趋势的国家城市体系空间结构,包括构造对接全球城市体系的空间结构——“三纵两横”国家城市体系发展轴线和由 6 个城市密集区、7 个城市群和 17 个城市发育区组成的次区域城市体系,建设与全球化相配套的国家城市体系支撑系统。陈波涛、郝寿义^[17]则认为,东中西部应该把协调发展和差异发展相结合,协调化发展即不同规模的城市应在城市体系中扮演不同角色,产业发展导向也应相应地根据其城市体系等级规模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而各异;而差异化发展就是根据特定区域的城市化水平采取相应的发展策略,或集中或分散。王发曾^[18]持有相似论点,认为 21 世纪发展中国家城市化需要将区域化发展与个性化发展相结合,针对后工业化时代给区域化发展提出的严峻挑战,产业的全球化迫使区域城市群统一组织市场优势并以集团的形式介入国际竞争,其策略就是城市体系的调控。

总之,国外学者对于城市体系的研究起步较早,在 1950~1960 年代,从中心地理论中分化出来,开始由单个城市的研究转向城市间协调发展的研究;进入 1990 年代,随着区域经济学和城市体系理论研究的不断分化与深入,学者们又从城市间研究转向微观,侧重于不同生产要

素流对区域和城市的影响。相比之下,国内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受到全球化的迅速蔓延而引发的,旨在探索处于快速转型期的中国应该如何把握全球化趋势、融入全球城市体系中去。

3 全球化浪潮下中国城市体系演变之路

近代中国的城市和区域经济发展,大致体现出从重要开放口岸,沿河流、铁路、公路以及依然使用的主要的传统陆上道路,向口岸的内陆腹地逐渐推进的特点。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演变,首先发端于沿海沿江的通商口岸,再沿着交通道路往广大的内地扩展,由此导致了各区域的巨变。沿海沿江口岸城市是中国商业和交通最发达、近代工业最集中的地带。1933 年,在我国除东北、台湾以外的工业最发达的 12 个城市中,沿海的上海、天津、青岛、广州、福州、汕头等 6 个口岸城市,占了工人总数的 72% 和生产净值的 85%;其次是沿江的南京、汉口、重庆等 3 个口岸城市,占了工人总数的 10% 和生产净值的 5%。同时,沿海沿江口岸也是中国近代城市成长最快、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民国时期的 7 个特别市和 12 个院辖市中,通商口岸城市分别占了 86% 和 83%。口岸城市和其腹地的双向经济联系形成了港口—腹地体系,促使商业联系、交通格局、区域发展、城市经济诸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推动了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奠定了现代中国城市体系的基本格局^[19]。

而 1980 年代以来,中国城市体系的空间结构、职能等级和产业分布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表明全球化趋势正是其演化的主要动力之一。不难发现,这种全球化趋势,基本上得自运输、通信、数据处理方面的技术革新以及由此而衍生的经济与技术知识性质的转型。世界经济的再结构过程开始加速进行,“世界重心已从大西洋沿岸转移到太平洋沿岸”^[20]。其时西方发达国家从传统的工业化向信息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转型,使得全球劳动分工发生很大变化,一部分城市成了商业、信息、资本服务聚集的地方,另一部分城市则成为制造装配中心。那么,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中国的城市体系内部空间结构具体是如何演变的?是通过哪些机制发生作用的?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概括而论,中国城市体系演化具有以下若干特征:

第一,全球化进程是城市体系演化的重要推动力。自中国实行对外开放以来,FDI 和对外贸易有力地促进了城市和区域经济增长。1980 年中国出口总额占 GDP 的比重只有 6%,到 2008 年,这一比例达到了 33%。从时间趋势来说,对外出口和外商投资呈逐渐增长趋势,表明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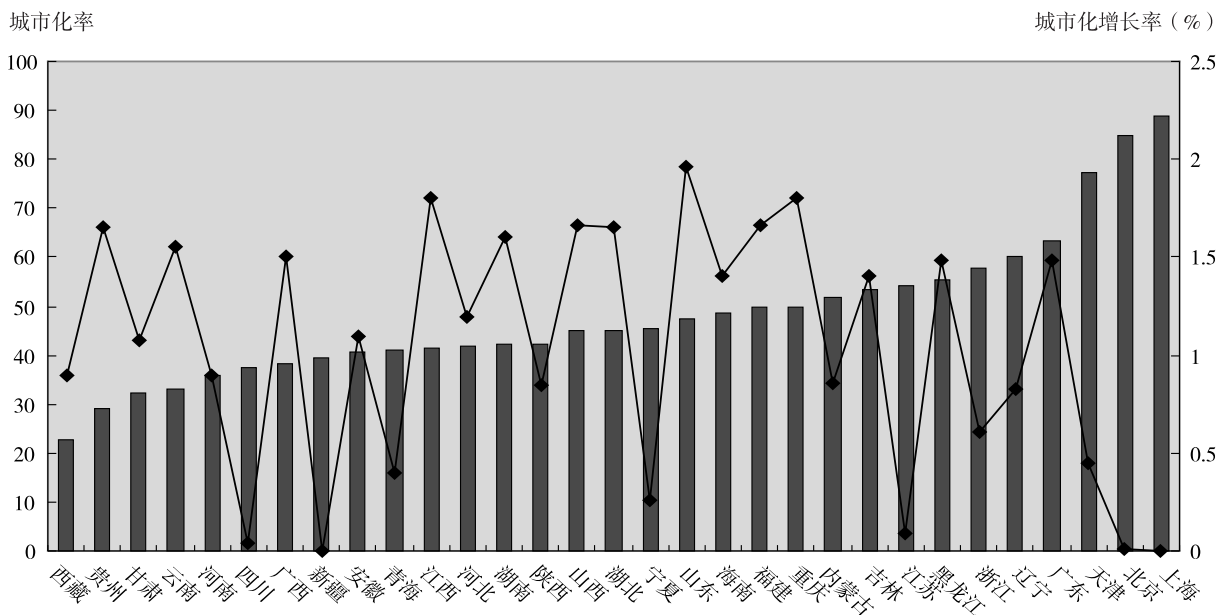


图1 2008年各省城市化率和增速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9》)

国与全球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从地区角度来说,以中国地级市的FDI为例,可以发现大部分FDI都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2005~2007年间中国外商投资前10位的城市,全部位于沿海地区,除了北京、天津和上海以外,其余城市主要是位于广东、江苏、山东、辽宁和浙江的沿海城市;而且,前10位的城市吸引外商投资的份额占到近40%^[21]。同时,中国跨省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也主要转移和集中至东部沿海地区,这一方面是东部地区承接国际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带来劳动力需求的结果,另一方面这也为这些地区的产业发展积累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加快了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像深圳、东莞、昆山等城市,都是在农村劳动力跨省转移的过程中由城镇迅速成长为大中城市的。

第二,大城市数量增多和城市群发展,突出地体现了集聚经济效应。观察1990~2008年间城市非农业人口数据的变化^[22],中国100万以上的城市个数明显增加:400万以上的城市,1990年有3个,2008年增加到13个;200万~400万的城市,1990年有11个,2008年增至28个;而100万~200万的城市,由1990年的37个增加到2008年的81个。人口100万以上城市总数达122个,占655个城市数的18.6%。一般来说,城市群是包括了大城市市区、中等城市和部分县城的城市连绵区。中国已有十数个规模很大的城市群,包括较为成熟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和京津城市群,以及正在快速形成

中的成一渝城市群、辽中南(沈一大)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福一厦一漳城市群、武汉城市群、郑一汴一洛城市群、西安城市群、哈一大一齐城市群、长一株一潭城市群等。这些城市群的形成,主要通过交通网络、人口流动、产业关联以及文化衔接等方面,使城市群内的城市之间建立起紧密的经济社会联系,产生出专业性小城市和综合性大城市功能互补的职能。而全国性城市体系的骨架正是由这大大小小的城市群架构而成的。

第三,与工业化进程相关,各省(市)的城市化率相差悬殊。如图1所示,各个省市的城市化率相差很大,即使是城市化率比较相近的省市,城市化增长的速率也相差悬殊。这种差异会影响到区域的城市体系的演化。

4 3D 框架下的实证分析

我们参考世界银行^[23]根据新经济地理和新贸易理论提出的3D(Density, Distance, Diversion)分析框架,来尝试分析中国城市体系的演化机制。简要地说,3D中的密度是指每单位土地的经济总量,即每单位土地经济活动的地理密度,往往经济越集中的地方越富裕;距离指商品、服务、劳务、资本、信息和观念在不同地区之间流动的难易程度,它并不完全是个物理概念,更重要的是由于基础设施落后和制度障碍造成的经济距离;分割则是指地区之间、国家之间商品、资本、人员和知识流动的限制因

素，即阻碍经济一体化有形和无形的障碍。

4.1 城市、区域——密度

从密度来看，最直观的是中国几座世界城市和一批新兴大城市的崛起。一方面，沿海世界城市、国际性大城市是全球化的产物，吸引人才和投资往“北上广”迁移，改变着这些区域的城市体系人口资源分布的空间格局。而且这些城市因为经济、科技、文化、教育、信息、人才的高度聚集及与周边城市乃至国外城市频繁的交互作用，通常都具有强大的枢纽、推进器和孵化器的功能。另一方面，新兴大城市的崛起成为一道醒目的景观。比如深圳市，从以前的小渔村一跃发展成为拥有常住人口1400万（尽管户籍人口只有200多万）的特大城市，正是大规模外资带动的结果。又比如宁波市，由于其在城市国际化过程中不断吸引了埃克森美孚、英国石油等化工行业巨头投资，成为全国重要的化工生产基地。宁波目前的引资量超过浙江全省的1/3，在贸易方面其创造的外贸顺差和一般贸易出口额均居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的首位^[24]。

与区位条件从而经济密度相关的，是中国城市群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性。在中国，城市群演化的路径大致可以这样描述：城市与周围其他地区，有着向心集聚和离心扩散两种空间联系，集聚经济效应使得城市人口和产业的集聚程度越来越高，而地租的昂贵和交通拥挤加之信息化放宽了时空的限制，竞租理论下外围的二三线城市对于土地密集型工业企业的吸引增加，导致城市空间的相对分散化和城市产业空间布局的改变；在全球化时代，这种被各种全球性的动力因素驱动的空间布局演化，就形成了全球分工链中的各类专业性城市和综合性城市；而随着单个城市规模扩大与实力的增强，对周边区域产生辐射带动效应，形成了一个又一个城市圈或都市圈；伴随着城市规模的进一步扩大，相邻城市辐射的区域不断接近并有部分重合，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相互影响越来越大，规模更大和功能更强的城市群便形成了。

本文采用牛凤瑞^[25]等人的“十大城市密集区”的城市群分类方法，对2007年中国十大城市群的经济密度进行了计算（表1）。

2007年中国十大城市群的经济密度 表1

城市群	GDP (万元)	土地面积 (km ²)	经济密度 (万元/km ²)
长三角	451384632	100703	4482.3355
珠三角	261999409	74324	3525.0983

续表

城市群	GDP (万元)	土地面积 (km ²)	经济密度 (万元/km ²)
京津	166628312	55184	3019.5041
辽中南	97653558	64634	1510.8698
山东半岛	164071545	70574	2324.8157
闽东南	177595665	132493	1340.4155
江汉地区	55782021	65003	858.1453
中原地区	57934685	31713	1826.8434
成都地区	39725649	18344	2165.5936
重庆地区	24153310	17433	1385.4936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8》、《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8》以及各地的政府网站和统计局网站）

由表1可知，各个城市群在经济总量、经济密度等指标上均差异悬殊，中国城市群经济空间的不均衡分布反映了这种态势。东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地区在经济总量上占有绝对优势，2007年这三大城市群的经济总量占到了十大城市群经济总量的58.79%。其中长三角城市群的经济总量是西部重庆城市群的18.7倍。在东部沿海地区，密集的城市群、聚集的城市人口和经济总量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东部沿海的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地区和辽中南4大块具有全国意义的经济和城市人口高度集聚的城市群，再加上山东半岛和闽东南这两块省内城市群地区，2007年6大块合计，在占沿海省市总面积54%的土地上，集中了沿海78%的国内生产总值（图2），成为中国主要的制造业产业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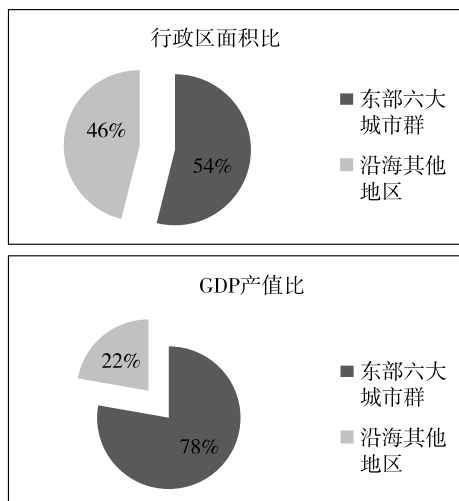


图2 沿海六大城市群与沿海其他地区的面积和GDP之比（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8》，具体数据由笔者计算得出）

4.2 城市、区域之间——距离

中国特有的“人口众多”和“地大物博”，在地理上是由“胡焕庸线”划分开来的。受自然条件、经济社会基础的影响，人口、产业、城市在区域之间的分布历来就不均匀。距离本质上属于经济概念，它的重要性已使其成为经济发展进而城市体系演化的关键因素。对商品服务贸易而言，距离包括时间成本和货币成本，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位置和质量、运输的可得性，会极大地影响任何两个地区的经济距离；对劳务流动而言，距离还包括离开熟悉地方的“心理成本”。就此意义而言，距离又是市场准入的形象化说法。

影响距离的第一个变量是交通通信的条件。近代以来，与外界联系的国门逐步被打开，“每一个港口控制着中国的一个主要区域。各个不同的港口（著名的有上海、汉口、广州与天津），就把国家的经济与政治生活引向了不同的方向”^[26]。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联系受当时情势的影响而中断，国家发展战略重视三线建设，引起交通路网、产业布局和城市体系一定程度上朝着均衡方向演化。到2008年，我国高速公路的总长度超过了6万km，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高速铁路运营总里程更是世界第一，而且还在迅速增长之中。当然，落后地区往往人烟稀少，将昂贵的基础设施延伸到这些地区，或者鼓励企业向这些地方搬迁，意义不大。实际上具有实质意义的，是要将基本公共服务推广到各个地方，即使到达这些偏远地区的成本较高。

由于交通通信的通达程度各地区存在差异，生产要素在各个城市、区域之间的流转速度和质量也就各不相同。虽然通信服务可以缩短城市间的时空差距，交通条件的改善也降低了货物运输的成本，但是距离市场与原产地之间的远近仍然是贸易和企业选址的重要权衡条件。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城市间的客货运量反映了城市体系间城市联系的紧密程度，它主要是通过以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空中走廊、港口和信息高速公路为骨干的快速通道网络来实现的。

影响距离的第二个变量，是国家的区域发展政策。无疑，中央政府的制度安排对于城市体系的格局和功能有着巨大的影响。这些制度安排包括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财政制度以及地方政府行政职能的转换，对于改变区域间的经济距离都有着直接的影响。中央政府实施分税制以来，相邻的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关系。地方政府之间为了发展本地经济，赢得消费市场，常常会设置区域间贸易障碍，

如抬高跨省区的税收或路桥费，从而改变跨区域流动的生产要素的成本。

尽管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城市体系，正在由原来按行政等级划分的空间结构演化成为以节点和节点间的信息流为基础的网络状结构，全球化以城市为枢纽渗透到各地方性的区域之中，从内部改变着城市和区域的空间结构。但是，考虑到实际的国情，政府政策能够对于一个地区的经济实施强有力的调控，从而深刻地影响该地区的空间格局。一个城市能否快速发展，关键要看其融入各类世界网络体系的程度。原来的区域性城市统统被拉进了世界的城市体系中，根据其规模和职能被要求在全球城市等级体系中扮演相应的角色。这样，各地政府对于城市功能和区域规划的定位就显得尤为关切。

生产要素区域间流转的状况，可以被看作是影响距离的第三个变量。生产要素在区域间的流转将导致区域间该要素密集度的差异，不同产业具有不同的要素密集度，比如高科技产业是高新技术密集的，要素密集度的差异将导致产业聚集度的差异，从而实现产业结构在空间上的重组。而对于同一产业而言，这种要素差异性将使不同的城市承担产业内部价值链的特定环节，从而形成“节点—轴”的特殊空间结构。可见产业结构和城市体系的演化是相互影响，相互推进的，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带来国际分工加深和跨国公司的发展，以及科技的创新和扩散，都在推动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空间重组，这一切落实到特定的区域中则表现为城市体系空间格局的变化；另一方面，产业结构的演化升级不断要求城市空间布局和职能结构持续优化并与之协同。因此，市场体系及产业组织网络，也是推进产业结构和城市体系演化的基础性条件。

吕国庆、汤茂林^[27]通过对沿海12省1998~2006年的制造业集聚程度的比较发现，集聚程度居前10位的行业名单中新增了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电子制造业和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造业，这说明中国沿海制造业发展有着朝着高新技术及重工业化发展的趋势，但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优势产业以及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优势同样仍得以保持和发展。长三角地区近年来的产业布局，尤其是制造业集聚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苏南地区的信息产业、机械产业分工，浙江省的服装产业分工，以及跨国公司和苏浙企业逐渐把公司总部、区域总部和研发机构建在上海市中心区，而把生产制造基地建在上海郊区和苏浙地区。这种在一个产业内价值链上的分工，正是生产要素流转以及其对于企业选址的影响的结果。在

这种新型产业分工过程中，大都市中心区因公司总部、研发和设计中心、营运中心等集聚而逐步发展成为管理控制中心，由于高层行政管理、财政、法律、广告以及研究与开发等职能主要集中在公司总部，因此这种总部相对集中的城市就自然发展成为区域、全国经济的地理控制点^[28]。

4.3 国家内部、国家之间——分割

分割指的是阻碍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商品、企业家、人员和信息流通的行政的或政治的壁垒。我们知道，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成功经验，是财政分权体制的作用结果，其孪生的一个弊病则是国内市场的行政性分割。本来一国内部市场的一体化即区域间要素的低成本流动，对于一国的经济发展从而城市体系的演化起着重要的作用；或者反过来可以说，一国内部市场的严重分割将阻碍一国的经济和城市体系的有序发展。可见一国内部市场的开放程度，直接影响着该国的需求水平和产业结构及企业规模。要实现国内市场一体化，做到区域之间的良性互动，发挥公共政策的效应便显得十分必要。也即是中央政府要努力缩小区域之间基础设施投入的差异，增加对农村地区的公共医疗和教育的投入，以此来内化由分税制引起区域竞争所产生的外部性，减少市场分割带来的经济效率的损失。

在分税制和 GDP 考核方法下，各地规避市场分割害处的主要做法，一是兴办开发区一类新城市空间，二是大力发展出口产业，加入全球贸易。开发区为什么在中国有那么强大的动力？为什么它在中国会成为一种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主要载体？说到底，还是集聚经济的作用。一方面，中国人多地少的矛盾突出，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投资环境条件不均一，采用开发区模式，便于集中公共资源，快速有效地营造起有利于企业选址的特殊空间；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作为利益主体，通过开发区招商引资，这对于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促进当地就业、税收、GDP 增长、城市发展等都有益处。至于各地为什么争先恐后利用 FDI 发展出口产业，这需从中国缺乏“市场”的角度来理解。它既是对广泛存在的市场扭曲的反应，又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市场扭曲对资源的低效配置。罗长远、张军^[29]认为，广泛存在的市场扭曲决定了中国的发展需要 FDI，通过利用 FDI，绕过了国内金融市场的扭曲，它与劳动力要素相结合，生产并出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进一步绕过了国内产品市场的扭曲。而财政分权为地方政府发展经济提供了动力，它们在基础设施、政策优惠上的竞争，为中国

吸引 FDI 创造了内部条件。通过利用 FDI，中国以“非一体化的国内市场”换取了“一体化的国际市场”和“看得见的市场信号”，通过参与国际分工，FDI 找到并实现了中国在全球的比较优势。然而，这种做法的直接后果是导致内需市场发育不足以及加重了城市体系的严重不均衡。

1992~1997 年，中国省际之间商品进口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50% 降至 38%，而省内对地方商品的吸收则从 68% 增至 72%。这与美国—加拿大商品的跨国界流通以及欧盟的跨国际边界流通大致相当^[30]。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自 2001 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对外贸易 2002~2008 年的年均增长率达到 25.9%。2004 年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 1 万亿美元大关，2009 年中国出口总额 12016.6 亿美元，已经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家。

经济学原理证明，自由贸易和分工深化有助于扩大经济规模和提高效率。但是现实的世界中，从对商品、资本、人口和知识等流动的温和限制到领土争端、内战和国家冲突，分割的形式多种多样，不一而足。国家之间的分割，经常性地表现在贸易壁垒等歧视性待遇上。比如，美中贸易出现逆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采取歧视性的贸易政策，严格控制高科技产品对中国的出口。加上西方国家对中国人权、宗教、知识产权等偏见，常常用诸如反倾销的手段作为制裁的工具。

中国对外贸易关系相对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中国出口产品主要输往美国和亚洲的韩国、日本、中国香港；进口来源地中，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名列前三。另外，与中国贸易进出口总额最大的前六个国家和地区（美国、日本、中国香港、韩国、中国台湾、德国）占到了中国对外贸易量的将近一半，达到 48.16%。从出口的商品类别比例来看，整个 1980 年代，工业制成品出口与进口所占比重都有大幅度提高，1984~1989 年，一直保持在 80% 以上；2001 年以来，进出口产品构成进一步发生变化，以 IT 产业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和进口高速增长，2008 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中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 29.1%，进口比重达到 30.2%。从区域分布看，中国 FDI 的基本格局明显呈“东高西低”之势（图 3）。

总的来说，中国利用 FDI 具有明显的时空分布差异，FDI “东高西低”的格局与政策因素密切相关。率先实施开放政策的地区一旦获得制度上的优势，对其潜在的区位优势发挥将产生重要的作用，并且会形成一种非均衡发展模式下的自我强化力量，这些都使外商倾向政策的影响更加重要而持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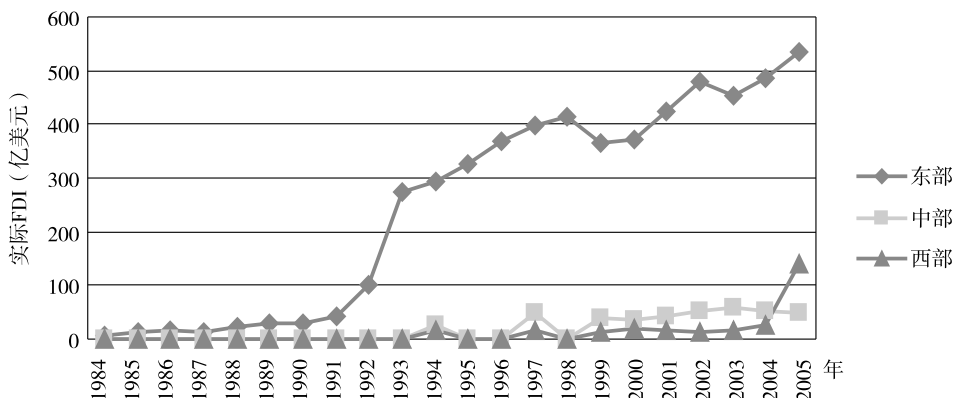


图3 1984~2005年实际FDI东中西部的分布图
(数据来源: 1984~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

5 新的全球化变局下中国城市体系演化的趋势

2008年底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全球经济原有的平衡和利益格局,使世界政治经济发展处于重新分化与整合之中。发达国家为了解决国内困难(以就业为例,美国2009年10月失业率升至10.2%,创下26年的最高水平),出现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态势,同时强力推进低碳经济的全球新战略。面临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经济发展动力的调整、国内产业结构的转换和环境成本的压力等一系列挑战,考虑到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化的变局以及二氧化碳减排的承诺,中国适时应对,加大了产业结构调整 and 基础设施投入,促进各区域振兴,刺激内需增长,发展低碳生态城市。因此不难预见,中国经济增长与城市发展模式将随之发生变化,产业和人口在空间上会重新布局,从而影响到我国城市体系的演化趋势。作为本文的最后部分,我们简要论述将对我国城市体系的演化起重要作用的几个因素:

第一,非平衡增长转向更加平衡的发展。出口驱动型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在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首先,来自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压力。沿海地区原先靠近世界市场,“密度”高、“距离”近,利用劳动力成本低、数量多的优势,迅速加入了全球产业链,成为全球重要的制造业基地。然而,由于严重依赖外资和外国技术而缺乏技术创新,造成人力资本积累瓶颈,使得城市的多样化经济发展不足。沿海地区产业经过20年的发展,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的转型异常艰难,中西部地区的产业也罕有享受到沿海地区的技术外溢。在

此情形下,如何促进地区间产业分工以实现地区层面上的集聚经济,成为中国城市体系演化的关键。其次,振兴内部市场的需求。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里,由于依赖出口,形成了中国生产、西方消费的模式,生产过分依赖国外市场,忽视了国内需求的培育和建设,不能很好地建立产品品牌,只获取产品的加工利润,变相压低了中国的劳动力工资。这样的发展模式,在短期内促进了沿海地区新兴城市的出现,但由于内部市场发展不足,城市难以充分利用“市场潜力”实现规模经济和城市功能的进一步提升。

可见,沿海地区产业升级和产业西移对于提高中国城市化区域均衡发展和城市体系质量至关重要。一方面,其可以提升东部地区城市化质量,吸引国内乃至全球高素质人才的集中,积极推动沿海地区城市成为世界先进的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另一方面,内地城市通过承接沿海产业,可以带动其工业增长和加快整体城市化水平提高。而新阶段的产业转移呈现若干新的特点:产业转移空间的集中,从而提高经济密度,这与节约集约使用土地、城乡统筹的城乡规划相协调;产业转移层次的提高,由以前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向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化;生产能力转移更具有综合性,很多产业是整体性转移,注重不同产业之间的相互整合,由单纯制造业向制造业、服务业和研发转移;产业转移的主导角色由政府向企业转变。这使得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中国城市体系的演化将通过多元的集聚而走向更加平衡。

第二,全面开花的区域振兴规划,对于国家城市体系的演化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近两三年来,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区域规划和区域文件。这些区域规划和文件,主要体现了国家的三个战略意图:其一,发挥各地积极性,一方面积极推动长三角、珠三角等条件较好的地区继

续加快发展、率先开发开放，另一方面促进欠发达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后来居上、实现跨越式发展，解决欠发达地区的发展瓶颈；其二，落实国家重大改革和发展战略，也即落实近年来国家围绕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科学发展陆续制定的一系列重大发展战略（如构建“两型”社会、推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等）；其三，继续深化区域合作与对外开放，选择若干有条件的区域，通过国家政策支持打造国家合作开放的新平台，全面提升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竞争力。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中央投入的4万亿建设资金中，有18000亿（占45%）用于铁路、公路、机场和城乡电网，四川灾后恢复重建10000亿（占25%），农村民生工程和农村基础设施3700亿（占9.25%），其他包括保障性安居工程、自主创新结构调整、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生态环境工程，分别为2800亿（占7%）、1600亿（占4%）、400亿（占1%）、3500亿（占8.75%）。这些投入大多是公共品。通过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降低交通运输成本，从而促进生产要素的流动，将有力地帮助企业和劳动者减少与经济密集区的距离。因此，国家实施区域振兴规划，是积极落实调结构、扩内需、走多元多极发展路径，构造更具活力与弹性的发展格局的战略构想；是对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和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等“四大板块”的区域战略进行的深化与细化，是对不同类型区域的分类指导，有利于强化发展的薄弱环节，拓展和完善全国的发展布局。这是国家大战略的调整，区域开发和空间布局从原来的侧重于东部沿海延伸到中部、西部和东北等地，通过发展中西部地区 and 欠发达地区来拉动国内消费市场，力图改变金融危机前的“外循环”为主向“双循环”（对内对外）转型，必将引发中国城市体系演化的新一轮异动。

第三，制度变革对于城市体系演化的作用。长期困扰城市化健康发展的城乡二元分割及其体制，也开始进入实质性的破除阶段。例如，2009年底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规定，从2010年1月1日起，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所有人员，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可在跨省就业时随同转移。国家还决定从2010年7月1日开始，流动人员跨省就业时可以转移自己的医保关系，个人账户可以跟随转移划转，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三种不同类型的医疗保险关系，也可以互相转移。至此，制约全国形成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的体制

障碍基本得到破除，在优化城乡人力资源配置的同时，为打破城乡二元分割和推进新形势下城市体系演化带来了持久的动力。

参考文献

[1] 李大伦. 经济全球化的两重性 [N]. 光明日报, 1998-12-27.

[2] Held D, McGrew A. Global transformations: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9.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经济展望 [M].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7.

[4] 顾朝林. 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8.

[5] Friedmann, J. and Wolff, G. World city formation: an agenda for research and action.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982, 6 (3): 309—344.

[6] Friedmann, J. The world city hypothesis. [J]. Development and Change, 1986, 17 (1): 69—83.

[7] Friedmann, J. Where we stand: a decade of world city research. In: Knox, P. N. and Taylor, P. J. (eds.) World Cities: in a World-economy [M]. Cambridge: Cambridge U. Press, 1995, 21—47.

[8] Sassen S.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Tokyo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9] Scott A J ed. Global City-regions: Trends, Theory, Policy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10] Skinner G W.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11] 周一星, 杨齐. 我国城镇等级体系变动的回顾及其省区地域类型 [J]. 地理学报, 1986, 41 (2).

[12] 顾朝林. 中国城镇体系等级规模分布模型及其结构预测 [J]. 经济地理, 1990 (3).

[13] 周军. 中国城镇体系研究: 综述与展望 [J]. 城市问题, 1995 (4).

[14] 顾朝林. 全球化与重建国家城市体系设想 [J]. 地理科学, 2005, 25 (6).

[15] 宁登. 21世纪中国城市化机制研究 [J]. 城市规划汇刊, 2000 (3).

[16] M. Fujita et al.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conomic Activities in Japan and China. [J]. Handbook of Regional and Urban Economics, Volume 4. Edited by J. V. Henderson and J. F. Thisse, 2004.

[17] 陈波涛, 郝寿义. 试论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道路 [J]. 人文地理, 2005 (5).

[18] 王发曾. 21世纪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深层次发展 [J]. 经济地理, 2003, 23 (6).

[19] 戴鞍钢. 近代上海与苏南浙北农村经济变迁 [J]. 中国农史, 1997 (2).

[20] 保罗·克拉瓦尔. 地理学思想史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21] 国家统计局.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2, 2006, 2007, 2008, 2009.

[22] 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 2009 [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9.

[23] 世界银行. 2009 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 重塑世界经济地理 [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

[24] 白友涛, 吴填, 俞晚霞. 引入与融合——城市国际化研究 [M].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8.

[25] 牛凤瑞. 城市学概论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26] 冀朝鼎. 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27] 吕国庆, 汤茂林. 我国沿海省市制造业集聚变动的实证分析 [J]. 城市发展研究, 2008 (6).

[28] 韩坚. 全球化背景下新型产业分工与城市经济发展研究 [J]. 北京城市发展研究, 2008 (6).

[29] 罗长远, 张军. 转型时期的外商直接投资: 中国的经验//张晏等. 走向平衡的增长——30 年改革开放的大国发展道路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30] Poncet, Sandra. A Fragmented China: Measures and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Domestic Market Integration. [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5, 13 (3): 409-30.

[31] 任远, 陈向明. 全球城市—区域的时代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

[32] 史健洁, 林炳耀.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化 [J]. 城市问题, 2002 (2).

[33] 吴缚龙, 马润潮, 张京祥. 转型与重构——中国城市发展多维透视 [M].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7.